

究竟谁是真正的虢国夫人

——我写《〈虢国夫人游春图〉考辨——兼谈“何家村藏宝”》

■姜一鸣

因为常年在大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，也因为对中国古代的艺术作品比较感兴趣，所以我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画册。上海书画出版社的“国宝在线”系列是我感兴趣的，因为价廉物美，印刷质量好，所以我几乎收集了全套。我对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（以下简称《虢图》）的研究就是因为在教学以及在临摹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——图中八匹马九个人，究竟哪一个是虢国夫人？于是我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研究，写成了《〈虢国夫人游春图〉考辨——兼谈“何家村藏宝”》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）一书。

究竟谁是虢国夫人？杨仁恺先生指认后面的“红裙女”为“虢国夫人”，并写入了中国美术史，但60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。然而，由于争辩双方的理由都不充分，主要是反对者没有深入下去，拿不出过硬的有针对性的证据，所以僵持不下，以致连著名文物专家沈从文先生也只能无奈地认为：“各有所见，难得定论。”

我觉得首先要对虢国夫人有充分了解，其次，更要对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与她有关的人物有一定认识。于是我一头扎进图书馆，尽可能地搜集那些散落在浩瀚古籍中的与虢国夫人有关的历史碎片。我搜集的资料足足有五六本，其内容也是“跨界”

的“大杂烩”：不光有文字的，同时也关注美术的、文物的；不光是虢国夫人的，与其有关的人物如唐玄宗、杨贵妃、李林甫、杨国忠等也一一被纳入观察研究的视野。随着资料的积累增加，各个“碎片”进入它应该所处的位置，虢国夫人的形象也就逐渐清晰起来。

原来虢国夫人由于和皇帝有着暧昧关系，加之对权力、金钱的强烈欲望，于是成为唐朝一个正式的高官，所以她的服装首先是“官服”。而唐代的官服与男装是一样的，这与当时风靡的“女穿男装”在形式上是一致的，但其内在原因却有所不同。“官服”（男装）成为虢国夫人的“常服”，因此在唐代的文字典籍中

很难找到虢国夫人穿“男装”的直接资料，因为官员穿官服很正常，所以现在能搜集到的都是一些侧面的“旁证材料”。

由于虢国夫人是一位年轻的风流寡妇，和杨国忠、唐玄宗关系暧昧，且毫不回避，老百姓就送她一个“雄狐”的绰号，就是说她是一个穿着男装的“狐狸精”。而虢国夫人的同僚和谄媚者则称呼她为“洞天圣酒将军”。老百姓是“调侃”，谄媚者则是恭维吹捧“雅号”，但两者的共同指向都是虢国夫人的男装形象。资料还显示，虢国夫人曾以“贵公子”的形象出现在其他名画中，她为自己的堂号起名为“翠鸳堂”，这都是“男性形象”的明确宣示。更重要的证据是皇帝的“三花御马”，身后紧跟的

婢女以及很多女性化的图案等都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“证据链”，得出虢国夫人穿男装官服的结论，我想，这应该可以为60多年的争论画上句号。

《虢图》几乎可以理解为唐代天宝年间的一张“历史照片”，它背后的历史、人物也因此鲜活起来。史书中多次提到虢国夫人“恃宠纳贿，其门如市”，所骑“三花御马”，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，也是唐玄宗“放弃皇权”“恩宠无度”的形象证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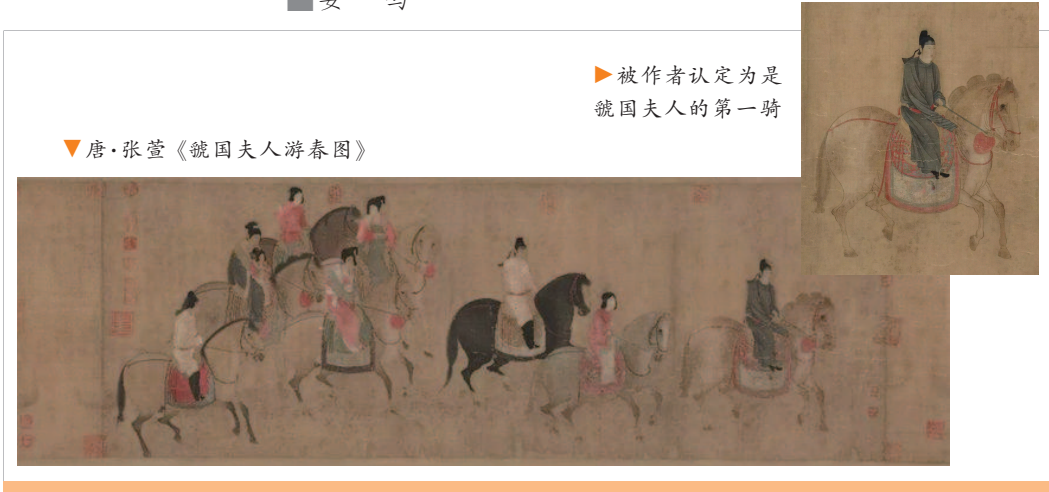
那唐玄宗在干什么呢？主要是热衷于道教的长生和梨园艺事，对朝政一点兴趣也没有。他整天迎来送往的人物是道士仙人，忙的是“投龙奠玉”，配药炼丹，所以我就把“何家村窖藏”中出土的

“投龙简”斋醮仪式中所用的“金龙驿”用到我文章的配图中。因为以前看到过“何家村窖藏”的一些图片，直觉应该是唐玄宗的物品，为慎重起见，我再对“何家村窖藏”进行一番研究，多次去上海图书馆借阅1971年的《文物》杂志和唯一全面介绍“何家村窖藏”的《花舞大唐春》，经过反复仔细地研究分析，得出自己的结论：“何家村窖藏”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物品，时间是“安史之乱”唐玄宗逃离长安的天宝十五载六月。埋藏者应该是皇帝最亲近最可信赖的人，当时可以说非虢国夫人和杨国忠莫属。

而在这一过程中，一个最大的意外收获竟然是根据“窖藏”中的一枚“鎏金永安五男铜钱”透露的蛛丝马迹，突然触发我对《游骑图》的画面记忆，“失踪”了700多年的唐代韩干名画《五王出游图》竟突然跳到了我的面前——这就是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·佚名《游骑图》，是描绘唐玄宗五兄弟连骑出游狩猎与打马球的情景。

犹如一段堵塞的历史管道一旦被打通，好多真相就水落石出。或许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？

由于宋徽宗痴迷绘画，曾广泛收集到韩干的名画52幅，都记录在《宣和画谱》之中，经过历史的狂风暴雨，如今只剩下二幅，一幅《照夜白图》在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，一幅《牧马图》在中国台湾的故宫博物院，大陆一幅也没有。所以，如果《游骑图》真的就是韩干名画《五王出游图》，那么这一发现无疑意义重大……



黎东方：卖票讲史第一人

■吴兴人

自古至今，说史讲史有两种人：一种是说书艺人，另一种为历史学家。讲史，多数是教师在课堂上讲历史，而卖票讲史并取得巨大成功者，黎东方为第一人。

黎东方是20世纪90年代旅美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，曾受业于梁任公先生。任公先生在清华讲《历史研究法》，东方教授得其真传。他的讲史，是学院派人物在剧院里讲史。他讲的是历史，而不是演义。但他讲的历史，又不同于当堂照本宣科背讲义。他在讲坛上，既不虚构一个人物，也不“戏说”故事情节，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中搜集和贯穿史料，按需而取，为我所用，材料信手拈来，借题即兴发挥，有时还借古喻今，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吸引了无数听众。诚如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为《细说三国》作序云：“抗战军兴，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，时应各地之请，为各界人士講演历史，通古识今，激励抗战。黎先生擅长讲演，有雄辩之才，每讲史，鼓动全场，听着动容。”

中国近代史上的文理大家顾毓琇有言：“人类有文化，文化成历史，历史即文化。”黎东方讲史，实为传播文化。1944年9月24日，黎先生在重庆中一路山东实验剧院一连讲十场。因为实验剧院院长王泊生是他的好朋友，把大礼堂借给黎东方，不收场租费，做成了一件普及中国文化的大好事，开了历史学家卖票讲史的风气之

先：黎东方细说三国。开讲十天，每天一讲。第一天讲合久必分，第十天讲分久必合，合符天下大势所趋，许多山城听众连听十场，大呼过瘾。

那么，为什么要在剧院里开讲卖票？黎先生直爽地回答：“因为穷。为什么穷？因为通货膨胀。战前，我的一份薪水，可以买100双皮鞋，或40担米。到了1944年，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一双皮鞋。买了皮鞋，便无钱买米。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。”

开讲卖票，以学问换取大米，也是一种谋生之道。

买票听讲，要有人来听。谁来买票？这开始是一个大难题。那时，没有互联网，也没有微信。发布开讲信息，要靠报纸上自费做广告。黎先生吃饭已成问题，怎么做得起广告？一家报纸有眼光，知悉后，特许他先登广告，后收广告费。另一家印刷公司也让他先印入场票，后收印刷费。没想到，讲史大受欢迎，一炮打响，头一天便来了300多人。每张门票两美元，一场演讲收入600多美元，开讲十天，黎先生经济上大翻身，总收入相当于几十个月的教授薪水，吃饭问题解决，还清广告费和印刷费，自然不在话下。

黎东方讲史于是名扬天下，卖票讲史接连不断，从重庆讲到昆明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又到南京、贵阳、安顺讲了几次，用960张讲演票的收入，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

港的小飞机“包机”费用。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他道贺说：“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。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多了。”黎东方回答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！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，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，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。”

黎东方成为半个世纪前的“易中天”。看来，直到今天，普及历史知识，还可以取得相当不错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，这里依然是一个古为今用的新天地。

黎东方讲史，不止于生动活泼，而且多有创见。他还还原真实曹操，替周瑜辩诬，正说诸葛亮，重评司马懿。他指出《三国演义》有的地方以假乱真。如张飞绝对不是一个性格鲁莽的人，在正史上，张飞原是富家子弟，文武双全，写得一手好字，生平的爱好是画美人，一改人们对张飞的认识。还有“连环计”中写王允有个丫环，名叫貂蝉，先许吕布，后送董卓，后来吕布杀董卓，这也是《三国演义》编出来的。貂蝉二字，原为汉朝后宫内女官的官名，地位比妃嫔低很多。貂蝉不是人名，更不是姓貂名蝉。王允家中，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丫环，倒是董卓家中可能有。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记载了他曾经“奸乱公主，妻略官人”。黎东方说得有根有据，令听众耳目一新。

黎东方还认为，曹氏篡汉，只是一个“篡”字，因为天下是曹操打出来的；而司马



篡魏，则不止于“篡”，还要加上一个“窃”字，因为司马懿得天下，还靠“骗”和“媚”偷来的。《细说三国》中谈到的事件，最着力的是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。在这两次大战中，有事更见人，写出了不同性格人物在事件中的活动，因而格外吸引读者。

黎东方指出野史也有可信之处。如孙策讨黄祖，为父报仇。卢溥《江表记》引野史《吴录》载孙策所上《表》一篇，黎东方以为是绝妙之文，断言此表为真。此外，在《细说清朝》中，他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，解答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之谜。如孝庄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、雍正是否为吕四娘所杀、乾隆是否是汉人之子，既有珍贵的史料价值，又有极强的可读性。

黎东方讲史，独创“细说体”，赢得了史学界专家们的高度评价。这种“细说体”，用历史学家马先醒的话来说，使听者、读者宛如身临其境，亲闻目接，以读三国的轻松心情，获得的却是胜于《三国志》的历史知识。